

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早期實踐與嬗變： 中山大學政治訓育的開展(1925-1928)*

芮駿宇**

廣東省全省第六次教育大會通過的〈黨化教育決議案〉明確提出了黨化教育的概念及舉措。隨後，中山大學設立政治訓育部，開展政治訓育，直接負責實踐國民黨黨化教育，實質是意圖在教育上貫徹「一個黨」「一種主義」的宗旨。「黨化教育」一詞曾被用作指摘共產黨干預教育，此時「黨化」的意涵則從「赤化」轉為「國民黨化」。在實踐上，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由戴季陶、朱家驊、何思源等人領導，具體多由社會科學科(法科)教員負責，黨、政、學三者高度結合。中山大學的黨化教育形成了政治訓育部與社會科學科(法科)相互協同的特殊形式。黨化教育干涉學術自由多被指摘的同時，學人多元的學源、立場與主張卻同時存在於黨化教育的框架之下，黨化教育一元化的目的相背離，實質造成了「黨化」的「異化」。1928年以後，社會普遍斥責黨化教育，戴季陶欲為其正名，故逐漸使用三民主義教育替代政治訓育和黨化教育的用詞，但「一個黨」「一種主義」的意圖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員細心審閱並予斧正，謹表謝忱。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通訊地址：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 135 號中山大學永芳堂。

電子郵件：volcano_alexru@163.com

關鍵詞：黨化教育、中山大學、政治訓育、社會科學科、三民主義
教育

一、引言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在教育領域實施「以黨領政」的重要方針，涉及其意識形態、政治架構和權力結構等各個方面，而國民黨改組與國民革命是國民黨黨化教育具體意涵發生變化的重要時間點。前人研究認為：「黨化教育最初作為孫中山革命思想的一部分，是向學生灌輸主義，鼓動學生為國民黨起來『運動』，隨著國民黨的改組，黨化教育成了國民黨一種較常規的『在教育界宣傳主義』的宣傳政策，而在國民黨已控制的地區，黨化教育則逐漸落在了教育領域，成了一種教育思想，而『灌輸以黨義』於各級學校」。¹亦有研究指出，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出版及宣傳案〉強調「使教育與國民黨的事業緊密結合」，「實際上已經透露國民黨亟欲實行『黨化教育』的意圖」。並進一步指出，黨化教育隨著北伐的推進向全國蔓延。²

國民革命時期，中山(廣東)大學為國民黨實際控制，是國民黨貫徹理念、落實教育政策的重要場所。葉文心關注到中山大學政治訓育與國民黨黨化教育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時關注到戴季陶、朱家驊等中山大學主要負責人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影響。葉文心認為戴、朱等人進入南京政府的重要部門，對國家高等教育制度作出了系統性的修訂，形成了「一個以黨化為中心思想的教育體系」。³沈成飛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李濟深與戴季陶在政治上有某種特殊關係。李濟深在中大政治訓育上有諸多建言，反映其個人主張的同時，也反映了地方軍政官員介入教育的目的。⁴可見，國民黨直接介入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嬗變有重要影響。但前人研究尚未能展開說明中山大學政治訓育的具體實踐。⁵由於中山大學的特殊地位，又因中山大學主

¹ 張太原，〈孫中山與黨化教育〉，《史學月刊》，第2期(開封，2007.02)，頁56。

² 盧毅，〈事與願違的黨化教育——以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福州，2014.05)，頁72。

³ 葉文心著，馮夏根、胡少誠、田嵩燕譯，《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113。

⁴ 沈成飛，〈李濟深與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廣州，2021.01)，頁66-68。

⁵ 關於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研究，早期有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近年有陳釗，《國民黨黨化教

要負責人與國民黨之特殊關係，中山大學政治訓育的具體實踐不僅是國民黨在高等院校實施黨化教育的具體個案，其具體實踐中的成敗得失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發展影響重大，最能反映國民黨黨化教育在國民革命前後的轉變。

前人研究述及國民黨黨化教育在高校的實踐，多提及「黨義」與「三民主義」課程，但是否只要開設三民主義的課程，就等同於黨化教育的開展呢？廣東公立法官學校畢業生劉賢年稱：「全國學校之有三民主義等課程者，實以本校與黃埔軍校為始。」⁶而李濟深在中山大學演講〈政治訓育部的工作和目的〉時，則是以黃埔軍校為對照，把黃埔軍校的政治訓練作為中山大學政治訓育學習和努力的標杆。⁷是否可以藉此將黨化教育的實踐追溯至廣東公立法官學校或黃埔軍校呢？本文試圖闡釋國民黨在中山大學開展黨化教育的具體實踐，進而討論這一關鍵時期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要轉變及其後的影響。

二、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的建立

1925年孫中山逝世以後，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呈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廣東大學為改名為中山大學作以紀念。國民黨中執委認為茲事體大，轉交政治委員會議辦。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召開第六十九次會議決定改名中山大學前先組成調查委員會瞭解廣大辦學情況。《廣州民國日報》總編輯陳孚木隨即在該報發表〈調查廣東大學之重要意義〉一文。隨後，《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派員查辦廣大〉，「調查」轉為「查辦」。⁸陳孚木藉此機會指摘廣東大學不能「培養革命人才」，「辜負政府設立此校之本意」，認為此時

育制度研究(1924-1937)》(西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以及劉娟、夏泉、劉晗等撰寫之論文，其中內容多有涉及中山大學進行之黨化教育，但亦僅止於說明中山大學設有政治訓育部，推行黨化教育等，並沒有進一步的研究。

⁶ 劉賢年，〈廣東公立法官學校之沿革與國立中山大學之關係〉，收於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編印委員會主編，《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臺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頁129。

⁷ 李濟深講，林霖筆記，〈政治訓育部的工作和目的〉，《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3。

⁸ 〈派員查辦廣東大學〉，《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5年10月16日，6版。

改廣東大學為中山大學，「有玷中山大學之名」。⁹此後，《廣州民國日報》所發文章及國民黨黨內來往函件均有「調查」與「查辦」兩詞混用的情形。其中，「查辦」一詞帶有懲戒之意，引起校內師生不滿。廣東大學內本就派系林立，藉機發難，引發了學生罷課、教授集體辭職的一系列風波，此間首次出現了關於「黨化教育」的論爭。其中，左派師生認為國民黨以黨立國，國立的廣東大學理所當然亦為黨立，理應實施「黨化教育」。而鄒魯為代表的右派師生則認為，鮑羅廷與中國共產黨把持廣州國民政府，運動學生，「黨化」教育，實為「赤化」教育。與其說鄒魯為代表的勢力是反對黨化教育，不如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左派，從而反對左派主導教育。為應付廣州國民政府的查辦，廣東大學首次將「三民主義」納入必修課，透過此方式表明以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為尊的態度，回應「赤化」的質疑。事件背後既有倒鄒與擁鄒的政治勢力對抗，也是不同話語的博弈，「黨化」的意涵因其立場而異。此後國民黨內派系紛爭不斷，黨化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凸顯，其意涵並不統一。

1926年5月，廣東省全省第六次教育大會通過了〈黨化教育決議案〉，包含了「訓育和學校教育行政」、「課程和編撰教材」和「統一教育權」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在「訓育和學校教育行政」方面提出了10項舉措：「校訓定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增設政治訓育部，施行政治訓育」；「設軍事教練」；「組織中國國民黨童子軍」；「舉行總理紀念週與政治報告」；「指導學生依全國學生總會所議決的組織法，組織學生會，以促進學生運動之統一」；「禁止反動思想之宣傳」；「協助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青年運動議決案之實施」；「指導學生參加農工運動及民眾運動」；蒐集「中國國民黨之宣傳物」，「指導學生閱讀」。在「課程和編纂課程」方面，明確要求加授「政治教育、社會科學及三民主義」，「定三民主義為必修科」，並「請教育行政委員會即行審查各校現行教科書」。附則明確講到，「各校均以中國國民黨化為原則」，不遵照執行予以取締。¹⁰這一決議案應該是最

⁹ 鄒魯，〈告孚木〉，收於鄒魯，《澄廬文選》（臺北：正中書局，1938），頁70（原載於《國立廣東大學週刊》，1925年11月30日，1版）。

¹⁰ 〈全省教育大會通過黨化教育決議案〉，《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5月10日，版次不詳。

早使用「黨化教育」一詞的決議之一，國民黨黨化教育落實於具體文件，其實踐逐步規範化、系統化與制度化。隨後，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甘乃光編寫〈實施黨化教育之大綱〉，列舉了加授三民主義、開設黨義研究科目、以黨義為原則審查教科書和出版物、舉行總理紀念週活動、組織關於黨義之特別演講、施行政治訓練、增設訓育部、培養訓育員、制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方針等 20 項舉措。¹¹其意旨及舉措與〈黨化教育決議案〉保持一致。總而言之，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黨化」主要反映在兩方面：第一，教學內容和形式的「黨化」，即以國民黨黨義為標準，設立或取締課程，加授政治教育、社會科學及三民主義的課程，開展總理紀念週等政治性質的活動；第二，教學組織上的「黨化」，即設立專門管理黨化教育的部門——政治訓育部，逐步將各級學校納入國民黨的統一管理。教育須在國民黨的指導下進行，受政治主導，為政治服務。其目的：「一則在乎引導學生思想，使趨於一致，一則在乎薰陶鼓舞，使他們為革命前驅，為建設的幹員。」¹²

同年，教育行政委員會先後頒佈了〈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章程〉、〈教科書審查規程〉和〈三民主義教科書審查規程〉等規章法令，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與三民主義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對既有教科書進行審查，編撰專門的三民主義書籍。¹³雖然，此時已經明確要求以「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為標準，稽核教科書和出版物，稽核課程和教員。但是，國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所提黨化教育並未有明確的反共立場。思想上，黨化教育禁止的反動思想明確列舉了「浪漫的無政府主義」、「狹隘的國家主義」、「復古思想」和「宗教」。雖然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關，但並未直接點明「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亦未直言反共。行動上，要求學生依法組織學生會，「以促進學生會之統一」，並要求「指導學生參加農工運

¹¹ 甘乃光，〈實施黨化教育之大綱〉，《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 年 11 月 3 日，5 版。

¹² 史尚寬，〈黨化教育的意義及其實施方法〉，《政治訓育》，第 2 卷第 1 期（廣州，1927.09），頁 14。

¹³ 〈三民主義教科書編撰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 年 5 月 14 日，6 版；〈公佈教科書審查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 年 10 月 9 日，5 版；〈三民主義教科書審查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 年 10 月 26 日，5 版。

動及民眾運動」，亦未明言反對學生運動。¹⁴其原因在於：其一，國民黨各方力量仍希望爭取蘇方的支持與援助，國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其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基層組織、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農村運動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北伐的推進仍需要勞工、學生、農民等各個社會階層及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一時間難以顛覆原有的主張與論述。國民黨一大以後，毛澤東曾代理國民黨宣傳部部長，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因此亦負責檢查各式宣傳材料。依他的觀察，當時國民黨的審查制度與宣傳工作顯然不盡如人意，他認為：「(一)黨報不健全；(二)對各種重要事件的宣傳指導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儘量地做；(三)指揮系統完全缺乏，上級與下級黨部的宣傳部間完全市區聯絡，成了人自為戰的局面，許多宣傳部負責人因此放棄職務；(四)監察糾正之職務，完全曠廢；(五)宣傳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給於下級黨部，完全未辦；(六)有計劃的黨內教育，幾乎沒有做；(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於文字，缺於圖畫。」¹⁵如前文所引，黨化教育往往被視為在教育界宣傳黨義的宣傳政策，毛澤東概括的效率低下、制度不全、組織失能、內容偏缺、形式單一的問題同樣反映在黨化教育的實踐之中。國民黨內對此應有所認識，因此意圖就黨化教育建立組織與制度，將此落實於具體實踐，進而草擬、頒佈並實施了〈黨化教育決議案〉〈實施黨化教育之大綱〉〈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章程〉〈教科書審查規程〉〈三民主義教科書審查規程〉等法案。概言之，黨化教育作為教育政策與舉措，不可能與整體的方略違背。

1926年9月，廣東省教育廳統領全省中等以上學校，以黨化精神整頓，全面實行黨化教育，各校設政治訓育處，開三民主義課程。依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長戴季陶的意見，¹⁶「大學之政治訓育，須仿效軍校例，設專部，不以

¹⁴ 〈全省教育大會通過黨化教育決議案〉，版次不詳。

¹⁵ 毛澤東，〈兩年來宣傳工作的回顧〉，收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11-12。

¹⁶ 依戴季陶的建議，中山大學此時採委員會制度，未採用校長制。委員會為學校行政負責主體，委員會設委員長。戴季陶支持採用委員會制的原因在於：其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國民黨受蘇聯影響頗深，國民黨各級組織形式多有採用委員會者；其二，委員會制名義上為集體負責，面對廣東大學校內複雜的派系關係，戴季陶可能希望藉此方式免受直接的衝擊。

校長當衡」。¹⁷此處仿效之軍校即黃埔軍校，李濟深〈政治訓育部的工作和目的〉亦以黃埔軍校為對照，軍校講求遵守紀律、服從命令之精神確系黨化教育所求，可見此時戴、李等人某種程度上確實認可黃埔軍校之訓育模式。1926年12月，依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命令，中山大學單獨設立政治訓育部，下設秘書處、教授科、編輯科、組織科和指導科。以李濟深、甘乃光、何香凝、陳其瑗、何思源、施存統、徐謙、顧孟餘與惲代英為委員，李濟深兼主任，甘乃光兼副主任。¹⁸學校行政層面，依戴季陶建議採委員會制，戴季陶為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徐謙、丁惟汾和朱家驊為委員。與此同時，戴季陶主張學校「以教授之評議會為立法機關，是大學能成為學者之民治」。¹⁹其中，委員何香凝、施存統、顧孟餘和惲代英等人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被視作國民黨左派。據前人研究考，施存統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與戴季陶早已在此相識。²⁰惲代英亦是早期中共黨員，此時為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此間編寫了政治講義數種，其中《政治學概論》對中共在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具有重要意義。除迥異的政治立場外，還有複雜的人際關係與派系關係。「顧孟餘有汪的『頭號軍師』、『諸葛亮』或『汪之靈魂』的稱號，與陳公博並稱汪身邊的『左膀右臂』」，在汪精衛各重要抉擇中扮演重要角色。²¹顧孟餘經由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的介紹，受丁惟汾的支援，加入中國國民黨，當中反映了蔡元培等人對其輔佐汪精衛的希望，也有李大釗

¹⁷ 戴季陶，〈赴粵後作法〉，收於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第2冊，頁609。

¹⁸ 〈國立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部第一次工作報告〉，收入李景文、馬小泉主編，《民國教育史料叢刊》（鄭州：民國教育史料叢刊，2015）第949冊，頁1。

¹⁹ 〈國立中山大學規程〉，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檔號020-001-59，頁158。

²⁰ 1920年6月，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建立黨組織的問題，戴季陶與施存統均有出席。其後，「戴季陶建議他(施存統)去日本，一邊學習，一邊治療肺病。他接受了戴季陶的建議。戴季陶不僅給予資助，還介紹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予以幫助。」赴日之時，帶有戴季陶予宮崎龍介的介紹信(何民勝，《施復亮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82-83)。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²¹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1-2。

促進國民黨「聯俄」、「聯共」政策的影響。²²這種錯綜複雜的派系關係與當時瞬息萬變的局勢有關，²³進而影響中大的穩定。1925年11月至1926年10月短短一年內，顧孟餘、陳公博、經亨頤和褚民誼先後被任命為廣東大學校長，或到任或拒絕接任，都引起不同程度的風波。

政治訓育部成立後，擬定了〈政治訓練大綱〉和〈政治訓育部組織法〉，明確政治訓練的意義在於：「黨的重要條件是嚴明的紀律與集中的組織，個人的活動只應是團體活動的一部分。在黨的紀律之下，個人的言論行動要完全受團體的支配。黨所以能指揮，要在黨員能建設一個意志的中心，這個意志的中心必須絕對的運用全黨的力量。」²⁴

政治訓育方式分作四種：演講；報告及討論會；批評會；實習。另外，擬定教授科目17項：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國民黨宣言、政綱及政策；國民黨組織及訓練；農民運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軍事運動；婦女運動；商民運動；一般群眾運動；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略史；現代中國經濟略史；世界政治經濟現狀；社會進化略史；各國革命史；社會政策大要。擬定的實習專案11項：黨部組織組；工人運動組；農民運動組；青年運動組；婦女運動組；軍事運動組；商民運動組；國際運動組；華僑運動組；一般群眾運動組；演說練習。²⁵目的在於：對非黨員進行宣傳，從而拉攏非黨員加入國民黨；對黨員加以訓練，加強黨員紀律。

三、政治訓育部的改組及其活動的開展

1927年4月，中國國民黨在上海進行清黨，廣州隨之爆發「四一五」事件，國共關係急劇惡化，黨化教育的實質意涵隨之發生變化，政治訓育的具

²²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頁69-73。

²³ 國民黨內各方勢力的立場、主張與舉措並非一成不變，在政治理想以外，往往需要考慮現實的情形。國民黨對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曾有明顯的轉變，各方勢力在不同時期的態度也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孫中山逝世以後，多方力量為謀求蘇方的支持，均曾先後以「左」自居。前人研究對此已有論述，可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²⁴ 〈中大政治訓練大綱〉，《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4。

²⁵ 〈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組織法〉，《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5-16。

體開展隨之調整。戴季陶在中山大學主持清黨，政治訓育部與之呼應，政治訓育的情形亦發生改變。政治訓育部主管的刊物《政治訓育》先後發表或轉載〈肅清共產黨叛徒之重要宣言〉、〈什麼是救黨的根本問題〉、〈為什麼要肅清中國共產黨，與我們應有的認識〉等文章，大肆宣傳清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²⁶反共成為政治訓育的主旋律，清黨則是政治訓育部重要職責之一。政治訓育部協同國民黨中大特別黨，開始對校內師生中的共產黨員及左派進行調查並開除其學籍或職務。

國民黨在中山大學進行清黨以後，政治訓育部委員人數不足，遂需進行改組。經第二十三次會議議決，主任李濟深、委員甘乃光留任，改派何思源為副主任，²⁷加派戴傳賢、朱家驊、傅斯年為委員，政治訓育部內的共產黨員及左派人士被完全革除。除秘書處仍舊略事變更，編輯科改為宣傳部，組織科改為組織部，指導科與教授科合併改為指導部。²⁸此前於 1926 年 6 月，中山大學廢除了委員會，重新實行校長制，戴季陶與朱家驊出任正副校長，全面掌握中山大學黨政事務。從《中山大學日報》與《政治訓育》所載之會議記錄來看，李濟深出席政治訓育部會議較少，考慮到李濟深同時兼有北伐軍總參謀長等職，實際直接參與中大政治訓育的時間可能不在多數。而政治訓育部副主任何思源為戴季陶所任命，同時兼任了中大特別黨部候補執行委員，

²⁶ 〈肅清共產黨叛徒之重要宣言〉，《政治訓育》，第 9 期(廣州，1927.04)，頁 6-18；林霖，〈什麼是救黨的根本問題〉，《政治訓育》，第 10 期(廣州，1927.04)，頁 1-2；鍾國樓，〈為什麼要肅清中國共產黨，與我們應有的認識〉，《政治訓育》，第 10 期(廣州，1927.04)，頁 3-5。

²⁷ 何思源(1896-1982)，字仙槎，山東荷澤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19 年考取官費留學美國，後輾轉於德國和法國之間。1926 年回國後，參與籌建中山大學，擔任中大經濟學系教授，曾兼任圖書館館長、經濟系主任、法科主任及政治訓育部副主任。1928 年，戴季陶推薦何思源出任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1928 年後主政山東，先後出任山東教育廳廳長、魯北行署主任、山東民政廳廳長、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1946 年 11 月調任北平市市長。1947 年 7 月 19 日，被派為北平選舉事務所主任委員，國民政府同時派定其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1949 年 1 月，被華北七省市參議會推選為和平談判首席代表。1949 年後，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1982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逝世。該簡介主要參考何茲全、丁嵐生、萬永光主編，《一位誠實愛國的山東學者——何思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²⁸ 〈國立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部第一次工作報告〉，頁 10。

應該是政治訓育的具體工作的實際負責人。何思源任職中大期間曾代表戴季陶接待外賓，其表現深受戴季陶的認可。他後來回憶稱「那時受戴季陶的影響，左右動搖，對魯迅支持不多」，²⁹可見戴季陶在政治上對他的影響。1928年以後，何思源被戴提拔進入仕途，³⁰更見二人之關係匪淺，絕非純粹的上下級關係。戴季陶借何思源之手管理政治訓育，實質上打破了政治訓育部「不以校長當衡」的獨立性。

除組織改組與人員調整外，政治訓育部提出了新的具體舉措。5月2日，政治訓育部召開部務會議，決議除依前訓練大綱實施訓練外，擬定進行計劃如下：明確要求「凡舉行民眾運動，全部職員須一致參加，以為學生表率」，「指導部每週政治演講及各種討論會聘請固定教授及指導員，務使中大學生，實受黨治訓育之益」，「組織部擬將學生中共產份子，全數取消學籍，改編各組，並調查本校學生之生活狀況」。³¹反共是此時國民黨內的首要任務，所擬計劃意圖強化國民黨在中大校內的一元領導，加強國民黨對學生及其活動的統一管理。

其中，政治訓育主要透過每週的政治演講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思想上的訓育，政治訓育之「政治」實質上具有泛政治化的意涵，並非指「政治學」的意思。從形式上來看，政治演講不是純粹的學術講座，而是當時中山大學實施黨化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政治訓練大綱及進行計劃擬定的政治訓育方式。

²⁹ 何思源，〈回憶我的一生〉，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2，頁988。

³⁰ 1928年3月13日，蔣介石二次北伐進入山東，何思源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育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4月7日，再被任命為代理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育部主任。根據何思源自己的回憶，此次調動為戴季陶舉薦。何思源回憶稱：「一九二八年初，蔣介石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我，寫信給蔣。這封信寫得很長，內容極力推重我。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來他的新交中，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我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戴說，我是一個最重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我大加辭色。」（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頁934）。進入軍隊以後，何思源仍是負責政治訓育的相關工作，一則是因為其舉薦人戴季陶長期以來負責意識形態相關工作，二則是因為何思源本身亦藉此方面工作表現而得戴季陶賞識。

³¹ 〈國立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部第一次工作報告〉，頁11。

內容上，政治演講的內容基本圍繞訓練大綱規定之教授科目，與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緊密相關，有著鮮明的反共立場。通過表一可以發現，與春季學期的演講相比，秋季學期政治演講多以批評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主旨，實則是配合清黨、反共開展訓育。

附表一、1927 年中山大學政治演講及講授者

序號	講授者	演講題目	講授時間
1	何思源	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略史	5月9日 5月16日 5月18日
		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之比較	5月23日 6月6日 6月13日
2	黃霖生	世界政治經濟現狀	5月11日 6月1日 6月8日
3	周學棠	國際政治	5月9日 5月16日
4	陳友琴	現代中國經濟略史	5月11日 5月18日
5	梅恕曾	現代中國經濟略史	5月25日
		現代政治趨勢	6月1日
6	高廷梓	歐美勞工政策	6月8日 6月15日
7	何思敬	社會進化大要	10月25日 11月3日
8	陳公博(陳公博請假，由曾濟寬代)	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	10月27日
9	劉振東	共產主義為什麼在國際間不能進行	11月3日
		節制資本之意義	12月6日 12月22日

			12月29日
10	朱兆莘	中國與國際聯盟	11月11日
11	伊光儀	社會主義概念	11月1日 11月11日 11月22日 12月8日
		批評馬克思主義	12月22日 12月27日
12	郭心崧	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組織、實業組織管理方法	11月24日
		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	12月8日
13	王志遠	工人運動	5月9日 5月16日
		各派社會主義的研究	11月1日 11月9日
14	楊道猷	各派社會主義的研究	11月24日 12月22日
15	關乾甫	中國國民黨與農民	12月29日

資料來源及說明：本表依據以下材料整理：(1)〈歸併大學後現在籌備中法科學院職科員一覽表〉，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檔號 020-001-15；(2)《國立中山大學日報》；(3)〈廣東省長指令第三五號(1919年9月30日)〉，《廣東教育公報》(廣州)，第7卷第4期(1919年10月)，頁29。受限於資料的掌握情況，本表格並未能全部收入所有政治演講之題目。表格所列之政治演講，主要依據《國立中山大學日報》每週之預告整理，未在校報刊發預告之演講，則未列入表格。《國立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第一次工作報告》所列教授未到之情形，亦未在表中列出。校報所刊之演講預告均為政治訓育部改組後之內容，開學初期即改組以前之內容並未囊括，故此間之政治演講題目未得而知。譬如，戴季陶演講〈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應該是政治訓育演講，在此演講開篇即講到：「這是政治訓育部開始講演的第一天，甘主任要我擔任三民主義的演講。」(戴季陶講，林霖記：〈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政治訓育》，第2期(廣州，1927.01)，頁8)校報並未刊出，具體開講時間亦不詳。又譬如，施存統應該亦曾做政治演講，施存統為《政治訓育叢書》第2集作者之一，在開篇〈自序〉中說：「現在，中大政治訓育已開始了，我擔任的是『社會進化略史』及伯簡君的『社會進化簡史』及我翻譯的蒲格達諾夫的『經濟科學大綱』，可以供同學參考，用不著再編講義。」

具體而言，在清黨的背景下，解釋三民主義成為政治訓育中尤為重要的命題，尤其是要解釋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

即是大同主義」。³²經濟學系教授陶因認為：「自從本黨發現共產黨的陰謀，將他們驅出黨外以來，有好多知識淺陋，根基薄弱的黨員，因極端仇視中國共產黨的結果，竟遷怒於社會主義，不知不覺之中，其思想漸漸有和資本主義接近的傾向。」³³亦即認為反對共產黨不能簡單等同於反對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陶因進一步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論證三民主義的必然性和科學性，是科學的社會主義。³⁴戴季陶在其系列演講中，重新論述三民主義與各派社會主義之關係，直接引用孫中山之言論，指出列寧主義是學三民主義的。戴季陶認為：「列寧所實施的社會主義理論，並不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而係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不過目標是向著共產主義進行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過渡，這恰和民生主義的理論不謀而合。」³⁵在他看來，三民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在於，三民主義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戴季陶在《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也講到，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性質與目的上相同，其不同在於哲學基礎與實行方法。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很單純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理論的基礎，而民生主義是以中國固有之理論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為基礎……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之直接革命行動為實行方法……民生主義是以國民革命的形式……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³⁶其目的不在於宣揚列寧主義，而是要在話語上與共產黨劃清界限。戴季陶奉孫中山及其言論為唯一經典，強調以「讀經」的方法進行解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重構三民主義，樹立三民主義與國民黨革命權威、甚至獨一無二的地位，最終透過控制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從而掌握國民黨黨內的話語權。不可否認他個人對於孫中山的

³² 〈民生主義第一講(1924年8月3日)〉，收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9，頁355。

³³ 陶因，〈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7期(廣州，1929)，頁12。

³⁴ 陶因，〈三民主義的必然性的觀察〉，《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5期(廣州，1929)，頁11-27。

³⁵ 戴季陶講，林霖記，〈列寧主義的特點〉，《政治訓育》，第10期(廣州，1927.04)，頁10。

³⁶ 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上海：民智書店，1926)，頁18-19。

極度推崇，故將孫中山所言奉為圭臬。但從實際效果考慮，若人人得以自命為「黨義」，則人人皆能代表國民黨，絕非謀求權力者所願。

但是，政治演講確實有其學術化乃至多元化的一面。林為棟回憶稱：「分小組訓練及大堂聽講，戴校長和甘副主任演講最多，共產份子施存統也講了許多課」。³⁷林的說法反映的應該是清黨前的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共兩黨藉此平台做話語競爭，拉攏學生支持。而透過表一我們可以發現，政治演講的內容與講演者個人的研究與立場的關係尤為密切，與社會科學科(法科)緊密結合。負責政治演講的講授者中，何思源、黃霖生、周學棠、梅恕曾、高廷梓、何思敬、陳公博、劉振東、伊光儀和郭心崧均是社會科學科(法科)的教授，其中何思源、高廷梓、何思敬和郭心崧曾擔任法科科系主要負責人，均有法學、政治學或經濟學的社會學科背景，大多有歐美留學經歷。政治訓育藉助社會學科教授，從社會學科的角度解讀國民黨的主義和理論，其演講題目多是其專業領域相關的內容。又因其帶有「政治」之名，前人研究甚至將此政治演講視作政治學講座。³⁸

以何思源〈社會政策大要〉為例，他在演講中講到：「社會政策就是根據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出來的經濟上當然的及合理的分配原理，而施行一切對於勞動的政策。」從經濟制度及制度所「根據的觀念和思想」出發，分析「社會政策的起源」，進而分析政策發展的階段、「主動力」、「步次」以及「社會政策所及的範圍」。³⁹實際上是基於其對歐洲經濟與社會的認識，運用其經濟學相關的理論與方法，提出了勞動問題的解決方法。何思源在歸國前夕，已撰寫〈國際經濟政策〉，介紹「經濟政策之原理」與「各國過去及現在的經驗」。⁴⁰之後又編有《近代歐美社會經濟及其發展》，以「中山大學政治訓

³⁷ 林為棟，〈往事依稀懷母校〉，收於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編印委員會主編，《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臺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頁182。

³⁸ 張緊跟，《百年曆程：1905-2005 中山大學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頁84-85。

³⁹ 何思源，〈社會政策大要〉，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2，頁680-691。

⁴⁰ 何思源，〈國際經濟政策〉，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1，頁2。

育叢書」發行，此亦應是其演講之一種。何思源所作之演講主要圍繞其關於經濟政策的主張展開，由此可一窺政治訓育演講與教授個人所持理論與方法之密切關係。

雖然，教授們可能話語上都服膺三民主義，但各自之立場與主張截然不同。即使清黨以後，校內仍有共產黨員與左派學者的蹤跡，只是從檯面走向地下。中大學生鍾貢勳回憶稱：「何畏(思敬)何思源兩先生都是十五年冬到校的。兩位都是接近群眾，肯和學生打成一版的。不過前者接近 CY 份子，而後者和所謂『士的』黨同學很好而已。何思源先生在清黨前後常參加大禮堂的機會，遊行時和我們一樣揮舞小旗高聲喊口號的。」⁴¹

在此之外，亦有教授的論述對三民主義或社會主義不持有明確立場，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形，提出不同的看法。經濟學系教授郭心崧就認為，中國沒有「鞏固的中央集權的中央機關，以統治一切經濟問題」；缺乏「稱職的官吏，以管理各種經濟活動」；人民對於國家缺乏信任；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組成成員的生活要負保障責任，原則上一切生產、分配、消費各種事業完全歸於中央機關管理」；因此，中國無法實施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⁴²黨化教育的目的在於思想的一元化，這種多元的傾向和解釋與其相悖。

1927年5月，蔡元培出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呈請變更教育制度，仿照法國施行大學區制。6月，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大學院組織法草案，國民政府訓令粵、浙、蘇三省試行，廣東暫緩實行。7月，國民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在此期間，大學院網羅學界英才，意欲實現「專家辦教學」「學者主政」的美好願景，實質是與國民黨黨化教育以政治與意識形態干預教育的目的相悖。國立中山大學在此期間曾改名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而政治訓育工作並未就此立即停息。

⁴¹ 鍾貢勳，〈戴校長與母校〉，收於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周年特刊編印委員會主編，《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周年特刊》（臺北：臺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頁78。其中，「士的黨」是指「孫文主義學會」，其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中山主義學會，因會員人手執一根手杖(stick)，故也稱「士的黨」。而廣東大學歷次風潮之中，曾多次發生學生以手杖打人之事，左派師生將此事歸咎「士的黨」，因此左派師生以此稱呼亦有貶抑之意。

⁴² 郭心崧，〈關於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之一面的觀察〉，《孤軍》，第3卷第6期（上海，1925.11），頁3-14。

1927年9月，「為重新整理及便利設施政治訓育起見」，政治訓育部全部組織從新釐定。除秘書處宣傳部仍舊辦理外，組織部取消合併指導部，並委任傅斯年為宣傳部主任，林霖為宣傳部秘書，何思源兼指導部主任，蒲良柱為指導部秘書。又增設編審委員會，專任編譯及審查本部叢書，設委員8人，聘定戴季陶、傅斯年、何思源、周佛海、何思敬、郭心崧、劉振東、杜光墀和史尚寬為委員。⁴³除傅斯年外，編審委員會各委員均是社會科學科(法科)教授。各出版物雖以國民黨黨義為中心，但其具體內容涵蓋了中國歷史與實際的多種面向，包括了：中國經濟的歷史及制度、中國各地民族狀況、中國各地勞動狀況、社會主義、各國革命史、各國政黨、各國勞動狀況及勞動政策、世界各民族變遷等政治、經濟、社會各學科領域。⁴⁴其出版物當中既有政治意味濃厚的著述，亦不乏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與譯作，乃至純粹的學術著作，譬如何思源所著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即是典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社會學科科學化的路徑與取向，重視數理的、歸納的、量化的和邏輯的研究方法，亦是以「國立中山大學政治訓育叢書」的名目出版。

四、「黨化」的「異化」

在社會科學科(法科)教授的主導下，政治訓育與社會學科緊密結合。國民黨利用社會學科開展政治訓育同時，也對最為關注社會現實的社會學科進行干預，而社會學科教授則反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大社會科學科的發展。早在1927年3月1日，國立廣東大學改名國立中山大學正式開學之時，依新訂之《國立中山大學規程》規定，原廣東大學法科學院改為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規程主旨「就是求黨化教育之精神，散入學術教育之骨肉，使兩者合拍，作我們的黨，去建我們的國，在一部分上所需要的供給。」⁴⁵依此規程所言，社會科學科的改名與改革實質上是黨化教育的一環。

⁴³ 〈政治訓育部最近改組情形〉，《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年9月21日，4版。

⁴⁴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訓育部征求研究著述及外國名著翻譯條例〉，《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8.09)，頁31-32。

⁴⁵ 《國立中山大學規程》，頁154。

具體而言，中山大學將法科改名為社會科學科應該是戴季陶的主張。朱家驊在〈中大籌備之經過和將來的希望〉中明確講到：「戴委員長提議把法科改為社會科學科……戴委員長本已新擬好了一個根本改革的計劃……」戴季陶認為：「『理科』這個名詞也舊的很，不能包括他的內容，故改為自然科學科」。⁴⁶在戴、朱二人看來，無論是法科或是理科的稱謂，都不足以概括各自學科的範疇，故主張改名。在戴季陶論述中，「科學」即是「分工」與「分科」。理科的分工是研究自然，故稱自然科學科。法科的分工是研究社會，故稱社會科學科。而分科治學的目的在於造就服務革命的專門人才。戴季陶認為「現代歐洲美洲的文化」是「科學的文化」，即是「分工合作的有組織的一個文化」。而國民黨乃至中國的問題就在於「分工合作的組織不良」「分工合作的組織不嚴密」，以至於「國民黨會弄到一團散沙，中華民族不能團結」。⁴⁷何思敬⁴⁸則說：「革命要求大學以大學所應有的去貢獻於革命全體。並且大學要適應革命全體的要求，就要造成適應於革命全體的各部分的人才。所以大學自己要『分工』，即分科，並且在各科裡頭也要細分，造成各部分的特殊人才，去參加革命工作。」⁴⁹即是要實現「學術的黨化」和「黨的學術

⁴⁶ 朱家驊講，林霖記，〈中大籌備之經過和將來的希望〉，《政治訓育》，第6期（廣州，1927），頁10。

⁴⁷ 戴季陶講，林霖記，〈世界的危機與我們應有的覺悟〉，《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8.09），頁21-22。

⁴⁸ 何思敬(1896-1968)，又名何瀏生，曾用筆名「何畏」投書。其父何仰韓早年與張靜江等國民黨元老有所交往。其父逝世後，何思敬隨張靜江赴上海，先後在上海通義銀行和世界社書店工作，後赴日學習。幾經輾轉，至192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1924年從美學轉至社會學，期間結識了郁達夫、郭沫若等人。1926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研究社會學。在日期間，受到河上肇教授的影響，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7年，應邀到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任教，當時中大並未設立社會學系，何思敬任經濟學系教授。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並未公開黨員身份，仍然在中大任教。至1935年，與學生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被當局追捕。1937年，輾轉至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員、中共中央軍委編譯處譯校、延安大學法律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領導成員等職。1948年3月，協助周恩來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準備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此後歷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和哲學系教授、系主任、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教授，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外交部專門委員，政法學會常務理事。以上簡介主要參考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年）。

⁴⁹ 何思敬，〈革命與社會學〉，頁12。

化」，大學既要培養「政治的革命者」，也要為「中國的革命」培養「有價值的專門家」。⁵⁰1927至1930年間，戴季陶、何思源與何思敬三人先後擔任社會科學科(法科)的負責人，三人同時兼任社會科學科(法科)下設政治學系和經濟學系的負責人。同時，校內黨政事務由戴季陶與朱家驊主管，政治訓育則直接由何思源負責。中山大學校務、黨務、政治訓育部與社會科學科(法科)人員上混同，黨化的理念在行政、黨務與學術上一以貫之。

但是，以「社會科學」命名「法科」並非個例，除黨化教育的影響外，主要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科學思潮的影響，還牽涉到國共兩黨話語競爭的因素。1922年，北京大學刊發的《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已使用社會科學一詞，季刊下設「法律與政治學類」、「經濟學類」和「其他社會科學類」三個欄目，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下設法律、政治、經濟三系，二者名稱與分類相仿。1926年，中國社會科學會成立，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法政大學等高校或設立社會科學科(院)，或創辦社會科學會。究其原因，與新文化運動後的科學思潮有關。社會學家陶孟和認為，「這個獨盛一時的法政的學術又漸漸沒有人顧問了，也漸漸為人所摒棄了」，「一時的呼聲只有『科學』」，「所謂科學就是自然的科學或是物質的科學」。⁵¹在清末民初的氛圍之中，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科學不僅在「空間的意義」上與其他文化區分，而且被納入了「時間和文明論的框架」之中，成為了新與舊、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進步與落後的分界。⁵²

同時，「社會科學」一詞的使用，暗含了不同政治立場在話語上的爭奪。20世紀20年代興起了新社會科學運動，所謂「新的社會科學」即是指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相關主張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科學，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相區別。⁵³1924年，陳啟修發表於《東方雜誌》的〈致北京大學

⁵⁰ 戴季陶，〈赴粵後作法〉，頁610。

⁵¹ 陶孟和，〈社會科學的否運〉，《現代評論》，第4卷第80期(北平，1926.06)，頁3。

⁵²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下卷第2部，頁1108。

⁵³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知識分子論叢》，第1期(上海，2009.12)，頁610。

同人書》就多次使用到了「新社會科學」一詞，隨後又先後編著出版了《新經濟學》和《新政治學》。尤其是在清黨以後，共產黨及左派知識分子為堅定自身信仰、加強相互連接、尋求理論支柱，更加重視理論構築，由此產生了一批著作。就中大而言，法科改名社會科學科以外，還設有社會科學研究會，於1926年12月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是中共廣東區委在中大成立的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組織，時任教務主任與文學系教授的魯迅曾捐款支持其活動。朱家驊對此組織「採取抵制態度，對該會經費、房子等問題多方阻難」。為此，魯迅曾與其爭論，稱：「我主張學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動自由，組織自由，這是北京大學五四的傳統。難道我們要現在的中山大學倒退十幾年嗎？」爾後，作為該會幹事之一的何思源被推為指導員。⁵⁴社會科學研究會未被取締而以何思源為指導的原因可能在於：其一，礙於新文化運動以後魯迅的全國影響力；其二，國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取締一校內的學術研究組織師出無名；其三，如前文所論，何思源為戴季陶與朱家驊所信任。⁵⁵

但社會科學科的改名與改革始終是在戴季陶的主導下進行的，黨化教育仍是主線之一。具體而言，黨化教育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的教育方針可以總結為：「本總理之理想學說，以攝取世界各國法律政治經濟諸學之精義，並研究中國有史以來，各種制度之變遷，以使外來之學術，合于總理之理想學說，併合於中國國情，以融匯東西古今之文化，並調和理想並實際之一致，期資助建設的國民革命于大成。此乃本科之使命，亦本科教育方針之第一義也。」⁵⁶朱家驊則說，「要發揚總理的主義」，必須「深究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和一般社會狀況」，並「以各國學說作參考，做輔助」。⁵⁷戴季陶提出了

⁵⁴ 何思源，〈回憶我的一生〉，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2，頁988-989。

⁵⁵ 如匿名審查人員所言，以「社會科學」為名並非此時獨有之做法。譬如，臺灣中研院及幾所大學設立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在1990年代更名的過程中，除了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外，其他則是更名為以社會科學為名的研究單位。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後，亦多有高校使用「社會科學」對相關學科或院所定名。雖然名稱轉換背後的動機並不相同，但是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政治與社會因素的影響。當代此種改名與改革多是高校去政治化的舉措，與1920年代中山大學之情形截然不同。

⁵⁶ 〈法科概述〉，收於《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頁140。

⁵⁷ 朱家驊，〈發刊詞〉，《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1期（廣州，1928），頁2。

「根本的改革方案」，即「以歷史為綱領，以現實為歸束」。⁵⁸這一構想實質上與戴季陶將孫中山與三民主義視作儒家「道統」之延續的理念一脈相承。戴季陶在其演說〈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中亦說：「現在要來講三民主義的理論，第一要瞭解的，就是我們不要單純的在理論中求理論的解釋，但要從歷史當中看出為什麼，何以要有這個理論的產生。」⁵⁹總括而言，即社會學科應以三民主義為統領，而無論是社會學科的研究，或是三民主義的解釋，均應從中國的歷史中尋求依據。

就具體舉措而言，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增設了日本論、蘇俄論、中國國民黨史、各國政黨論和近時世界政治等科目。其目的與思路可以史尚寬的說法做一概括——「使學生所見所聞都是革命事情」，達到「使學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就是要教授就其專業結合革命的現實進行教學，「講法律的教師可說說中國怎麼樣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講經濟的教師可以說說中國經濟落後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他如關於農，工，商各項教程都可以借題發揮，以為黨化教育的補助」。⁶⁰但實際上，本國化、實用化與科學化是社會學科發展普遍存在的特質。近代各國社會學科的發展均有相似路徑，依據各國的歷史與現實，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本總理之理想學說」畢竟只是綱領性的口號，其落實則需藉助教授們的力量，因此，社會學科教授們反而有機會利用黨化教育的口號，以政治訓育的實踐落實了他們個人的學術主張。

何思源與何思敬主持社會科學科(法科)期間，⁶¹中山大學雖未單獨就社會學設立科系，但是由於他們二人的重視，⁶²利用黨化教育的口號與政治訓育

⁵⁸ 戴季陶，〈中山大學法科的建設講詞〉，收於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第2冊，頁647-655。

⁵⁹ 戴季陶講，林霖記，〈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政治訓育》，第2期（廣州，1927.01），頁9。

⁶⁰ 史尚寬，〈黨化教育的意義及其實施方法〉，《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7.09），頁15-16。

⁶¹ 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何思源與何思敬分別為社會科學科正副主任；1928年9月至1930年，何思源出任軍職，改由戴季陶與何思敬擔任法科正副主任。1920年代後期，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科(法科)基本由何思源與何思敬主導。

⁶² 何思源認為社會學在社會學科中尤為重要，表現在於：第一，「社會學是各種社會科學的基本的或元素的科學，它是講社會元素(Social Elements)及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學問，它是研究各特別科學的 Postulate 為那些他們的根據的」；第二，

的便利，極大地推動了社會學在中山大學的發展，為之後獨立設立社會學系奠定了基礎。當時，社會科學科(法科)下設三學系均開設社會學概論的選修課，法律學系專開有「社會分工論」的選修，法律系甚至以「自任之社會學的研究」替代四年級之必修科法理學。⁶³同時，社會科學科(法科)下設法律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三學系均對學生開設社會學概論的選修課。可見，何思源與何思敬二人對社會學高度重視，並將此認識落實於教學之中。

具體到社會學概論的課程而言，則反映出了何思敬的個人傾向。該課程教學綱要如下：「導論：社會生活與社會思想，社會概念之發生，社會學為科學的系統的社會思想，社會學小史。本論：社會學的性質，物件，與方法；唯物的辯證法；歷史的唯物論；社會的生產；社會意識或集合意識；社會之進化。」⁶⁴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唯物主義的社會本體論、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批判、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階級等問題屬於馬克思關注核心論題。⁶⁵何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非一言兩語就能清晰述說，但是，中大社會學概論課程涉及和關注的「唯物的辯證法」、「歷史的唯物論」和「集合意識」等問題，毫無疑問屬於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流派的主要特徵。在眾多的社會學流派當中，專選馬克思學說用於教學，應該是受到了何思敬的影響。依何思敬自己的回憶，此時他尚未與中共黨組織建立正式聯繫，在教學中宣揚馬列主義應該屬於個人行為。⁶⁶但

「社會學是綜合的科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綜合(Synthesis of All Social Sciences)」。
此處詳見何思源，〈社會科學研究法〉，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2，頁656-658。

⁶³ 〈法科課程〉，收於《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山大學圖書館藏，1930年2月，頁155。

⁶⁴ 〈法科課程〉，收於《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山大學圖書館藏，1930年2月，頁150。

⁶⁵ 羅布·斯通斯主編，姚偉、李娜譯，《核心社會學思想家(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51-58。

⁶⁶ 何思敬與中共黨員早有聯繫，但此時未與中共組織建立聯繫，因此亦不存在受中共領導行事之事。何思敬的回憶中，最早一筆關於尋找中共黨組織的記錄稱：「我1930年曾到上海找黨。鄭伯奇告訴我，現在找黨不容易，你還是先回廣州去教書好了。王獨清已經是托陳取消派了，不要理他們好了。」詳見何思敬，〈我的60年曆史的一個輪廓〉，收於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頁24。遲至1932年，何思敬

是如前文所述，在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以後，中共及左派知識分子竭力進行馬列主義的本國化，在物理上被擠壓發展空間時，則在思想層面尋求延續。以此而論，何思敬的主張與行徑並未脫離左派知識分子的主流。而何思敬在中大清黨的情形下，仍能繼續宣揚馬列主義，主要原因在於：其一，政局情勢混亂，國民黨內忙於黨爭，以至於令出多頭，嚴厲清黨的同時卻疏於細節的管控；其二，何思敬個人與張靜江等國民黨元老關係密切，與戴季陶、朱家驊等人本已熟識，甚至深受國民黨高層的信任與賞識。⁶⁷

才由韓托夫、沈志遠二人介紹，正式加入共產黨，詳見韓托夫，〈何思敬入黨前後〉，收於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頁 100-101。

⁶⁷ 何思敬之父何仰韓與張靜江已有私誼，何思敬胞弟何亦民回憶稱：「我爸爸的小名叫金德，他去世時我只有五歲，我知道的一些情況，是我婆告訴我的，我爸爸上私學後考上了童生，之後因沒有條件再沒有上學，十六、七歲時，經人介紹到張靜江家，給張靜江的媽抄經文，因他字寫的好，長的體面，又年輕，張靜江的媽把他介紹到上海東南角一個叫瀏河鎮的鎮上工作，工作單位就是張靜江的爸開設的鹽務局。」詳見何思敬，〈我的爸爸何仰韓〉，收於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頁 37。不同人對何仰韓與張靜江的關係的記錄雖稍有差異，甚至有記錄稱何仰韓曾參與協助張靜江革命工作。但是均提及二人早有私誼。在何仰韓去世以後，其子何思敬前往上海投奔張靜江。在張靜江主辦的世界社書店和通義銀行學徒，而世界社書店和通義銀行與同盟會之關係尤為密切。若只是普通的上司與下屬關係，張靜江似乎不必在何仰韓去世後將其子留在身邊，甚至此後何思敬赴日留學亦得張靜江的資助。

亦是因為在世界社書店和通義銀行工作，何思敬得以與戴季陶、朱家驊等人相識。朱家驊在同濟大學發起中國敢死團，期間何思敬曾為其代收密信，此事記載見於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雜誌出版社，1969），頁 5，亦見於何思敬，〈我的 60 年曆史的一個輪廓〉，收於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頁 21。二者的記錄稍有差異，何思敬的回憶強調此舉只是舉手之勞，而非直接參與。但是，考慮到何思敬的回憶成文於中國大陸，可能有政治上的考量與顧慮，故刻意淡化他與朱家驊的關係。而在此期間，何思敬應該也曾與孫中山有所交集。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何思敬曾向張靜江、戴季陶等人呼籲停止內戰、停止剿共，戴季陶稱其是書呆子，他回應稱：「我要『奉旨』讀書，你們總理（指孫中山）叫我好好讀書的。」詳見侯達，〈回憶何思敬同志〉，收於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頁 74。此處，一則可見何思敬與張靜江、戴季陶等人有直接的交往，可以討論國共關係等話題；二則可見孫中山曾對其「耳提面命」，令其好好讀書。

又由於何思源個人深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對社會調查極為重視，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學雖未有社會學系，但已經以政治訓育調查民生的名義，開始開展社會調查。他將社會學總結為六個學派：「社會工藝學派(Social Technic)」、「方法的社會學(Methodological Sociology)」、「群眾心理學派」、「社會分析派(Social Analysis)」、「社會調查派(Social Survey)」和「社會病症派(Social Diagnosis)」。⁶⁸這種概括與其說是社會學的發展趨勢，不如說是當時美國社會學的發展狀況，反映了美國社會學對何思源的影響。其中，被何思源單獨歸為一派的「社會調查派」，一般被視作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重要組成。該學派興盛於 20 世紀 20 至 30 年代，由以羅伯特·派克(Robert Park)為代表的城市社會學家建立、引領，他們尤其關注城市貧窮、淒涼、陰暗的一面。社會調查是該學派主要的形式特徵，何思源將其歸結為「社會調查派」亦反映其特徵的一方面。從研究物件和內容上來說，其研究核心集中於城市研究。這種研究路徑與取向對何思源有所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芝加哥社會學派或是社會調查學派的稱謂，都是他者的概括、總結與抽象。由於關注點的側重有所不同，其命名與歸納也會受到影響。何思源使用社會調查派的稱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社會調查這一研究方法的重視。

1927 年 6 月，在何思源與何思敬的主持下，政治訓育部組織黨員學生在暑假進行社會調查，以各討論小組為分組，規定每人擇定一種，不領取表格進行調查者即作訓育曠課處理。⁶⁹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稱：「本黨革命最後之目的，在解決民生問題，要解決民生問題，第一步功夫須先從事於社會實況之調查。……社會調查與統計實為解決一切社會民生問題之根據。」⁷⁰可見，政治訓育部組織社會調查，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充分運用社會學科的研究為黨化服務。何思敬認為，社會學要「幫助」革命，要將「革命」視作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以解答「革命這個現象是如何發生的」這一問題，從而歸納社會革命發生的條件，包括了五個取向：第一，「至今的社會的批判」，

⁶⁸ 何思源，〈社會學原理〉，收於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卷 2，頁 643-645。

⁶⁹ 〈政治訓育部佈告〉，《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 年 6 月 16 日，2 版。

⁷⁰ 〈政治訓育部指定各種社會調查表〉，《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 年 6 月 16 日，2 版。

即「要知道一個社會何以會受侵略」；第二，「今後的社會的計劃」，即「要不使帝國主義再能存在的社會」；第三，「達到新社會的種種原則的理論的行動」；第四，「參加革命行動的民眾」；第五，「指導民眾實行革命的團體——革命黨(國民黨)」。⁷¹但正如前人研究所揭示的，由於立場的不同，「革命」一詞的含義可能截然不同。⁷²信奉共產主義的何思敬所言的革命顯然與戴季陶等人不一致，但並不妨礙他運用「革命」「黨化」的話語。

可見，無論是社會科學科的改名，或是政治訓育部暑期組織的社會調查，亦或是社會學學科的開展，均是以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名義進行的，其宗旨與口號均是以三民主義統領各社會學科的展開，實現意識形態灌輸與控制的泛政治化目的，但事實上反被何思源與何思敬所運用，將其個人的學術理念付諸實踐，甚至藉此開展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與傳播，以至黨化教育的實施事與願違。

五、從黨化教育到三民主義教育

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始終遠未及戴季陶等人之所願。其時中大學生多缺席政治訓育部組織的政治演講等政治訓育活動，政治訓育部將此類活動定為必修亦未能在根本上杜絕。即使是「對聽講及小組會議都沒有缺過席」者也稱「但期終沒有考試，便告結束」，似有虎頭蛇尾之意。⁷³遑論教授多有不同立場與主張，已在前述。即使秉持支援三民主義的主張，其解讀亦有其個人的見解，無法達到一致反共的目的。戴季陶與朱家驊甚至認為，共產黨「劫持」中大政治訓育部，「強加彼等策術，以致各校政治訓育甚有根本不合之處，其流弊最大即今尚未洗刷淨盡者，即在政治訓育之中好談鬥爭，專事空論，於切實知識人格訓育，反若不及」。⁷⁴遂於 1928 年年初，中山大學政治

⁷¹ 何思敬，〈革命與社會學〉，《政治訓育》，第 2 卷第 1 期(廣州，1928.09)，頁 11。

⁷² 由於立場的區別引起的話語的差異可以說頗為常見。以「革命」話語為例，則國共雙方及國民黨內各方力量均以「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撻伐對手。此種論述可參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⁷³ 林為棟，〈往事依稀懷母校〉，頁 182。

⁷⁴ 〈佈告〉，《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 年 3 月 6 日，1 版。

訓育部宣告結束。⁷⁵政治訓育部主辦的《政治訓育》亦隨之結束，校報《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則轉由教務處接管。⁷⁶

戴季陶隨後先提出〈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案〉。1928年4月，又組織兩廣教育界人士討論並形成了〈確立教育方針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以立救國大計案〉，以中山大學、廣東省教育廳、廣西省教育廳的名義，提交予全國教育大會。⁷⁷為「救濟現在之青年」提出「確定學生會之組織及其法律關係」。將學生會限定為「學校學生之自治團體」，禁止學生會「濫用其權能，以干涉國家政治，學校行政」。戴季陶認為過往之學生組織「模仿政黨組織，設定農民工人青年婦女等部，忘卻自身之職責，及漠視自治基本工作，從事於超過其能力之運動，其屬錯誤」，將學生會之功能限制為自治(一切關於生活秩序之工作，及結社集會雄辯之擬製訓練等)、智育(科學組織之研究等)、德育(科學組織之研究等)和體育(一切體育運動等)。⁷⁸聲稱「不把學校和學生攪在最危險的政爭中去」。⁷⁹

這一提議的提出與形成，應該受到了他對中山(廣東)大學實際情況進行經驗總結的影響。廣東大學建立以後，尤其是孫中山逝世後，校內學生派系林立，學潮不斷，對國民黨在高校的影響力形成了巨大挑戰。鍾貢勳描述當時的情形，說：「校內教職員學生，派別分歧，情形複雜。有國民黨青年團，有西山會議派，有『士的』黨，……有中社，有共產黨青年團，還有正式的共產黨黨員和跨黨份子。『士的』黨和西山會議派算是極右派，中社是偏右的，國民黨青年團是偏左的，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⁸⁰表面上，戴季陶

⁷⁵ 侃爭，〈臨別的話〉，《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年1月7日，1版。

⁷⁶ 〈教務處通函續辦日報由〉，《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年2月13日，1版。

⁷⁷ 前人研究對此案已有詳細論述，講述其成案經過及具體內容，譬如劉娟〈「兩廣提案」與大學院全國教育會議〉(劉娟，〈「兩廣提案」與大學院全國教育會議〉，《教育史研究》，第1期(北京，2020.03)，頁38-46)。雖然此案之形成與戴季陶主政中山大學應有較深關係，但該案所涉之社會教育、女子教育及師範教育等具體內容並非本文之主要關注，故在此不作贅述。

⁷⁸ 戴季陶，〈確立教育方針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以立救國大計案〉，收於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第2冊，頁449-450。

⁷⁹ 〈戴季陶致中大教職員學生書〉，《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8年1月7日，4版。

⁸⁰ 鍾貢勳，〈戴校長與母校〉，頁72。

的言論似乎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生參與革命；實質上，戴季陶認為「廣州學生情況，其始則因共產黨與國民黨界限不清，所謂只問革命不問主義之說，誤了根本大事。」⁸¹可見，從始而終戴季陶並非反對「黨化」，而是反對共產黨化；並非反對學生組織政黨化、政治化，而是反對學生組織共產黨化。戴季陶雖然是該提案之主導者，但其個人的立場與主張能否等同於全體之意志尚存疑慮。全程參與議案起草的有戴季陶、許崇清、何思敬、沈鵬飛、陳宗南、傅斯年和莊澤宣。其中如沈鵬飛，在戴季陶與朱家驊離校期間，能夠代表戴朱代行校長職務，其立場應該大致與戴一致，受到戴季陶的信任。但是，何思敬則極有可能與此不同，如前文所述，何思敬本身持有左派的政治立場，在中大任教期間已乘機講授馬克思的學說與理論。由此考慮，何思敬參與提案，一則是因為法科負責人職務之故，另則可能不是為了讓學生脫離政治，而是希望政治脫離教育，再則其思想認識也可能處於發展變化之中。特別應該注意到人物的多面性，不能以標籤的方式解讀、分析。以戴季陶為例，戴季陶曾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等中共早期組織關係密切，對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理論學說有其獨到見解，同時又對孫中山推崇備至，可見其複雜性。

同時，戴季陶關於黨化教育的論述亦發生改變，否定「黨化教育」這一用詞，主張直接稱為「三民主義教育」。⁸²戴季陶認為，「黨化二字，內容既不確定，出處亦不明瞭，總理著作，大會議決，均無此名，僅為個人爭意氣之假名，而為不求甚解者所習用，名不正則言不順」，而要真正落實三民主義教育，則要「將三民主義之精神，融化於一切教科教材之中，無一處一時不具三民主義之功用」。⁸³許崇清則說：「國民黨以黨治國，用三民主義建設國家，本應統一意志，無用另設教育宗旨」。⁸⁴

⁸¹ 戴季陶，〈致中山大學沈鵬飛先生暨同人書〉，收於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第2冊，頁623。

⁸² 戴季陶，〈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案〉，收於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第2冊，頁430。

⁸³ 戴季陶，〈確立教育方針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以立救國大計案〉，頁437-438。

⁸⁴ 〈廢止黨化教育名詞，決用三民主義教育〉，《申報》（上海），1928年5月17日，11版。

措辭變更背後往往有其特殊的訴求，或是實際情形的變更。蔣介石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後，為緩和輿論對訓政的批評，也曾趨向於言論的寬鬆，他於1930年10月曾說：「從今以後無論是什麼政見，只要不違背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所講的話，不越出這個範圍之外，什麼言論，統統可以任其自由，並且我們還要盡量容納國民的輿論。」⁸⁵戴季陶主張黨化教育變更名稱的原因可能與此相仿，應該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考量：第一，當時關於黨化教育的討論與批評甚囂塵上，教育界人士多有譴責黨化教育侵犯學術自由者，戴季陶以「三民主義教育」代稱，可能意圖相對弱化黨政干涉教育的印象；第二，戴季陶認為「黨化」二字出處不明，以此為由要求不再使用「黨化」二字，與他「把主義當佛經般『一個字，一句話去唸』」⁸⁶的主張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這並未脫離「一個政黨」和「一種主義」的主旨與立場，強調詞彙的出處，反而可能增強了對「一種主義」解釋權的掌握。黨化教育之「黨化」即國民黨化，但國民黨內派系分化，紛爭不斷，何者才是革命正朔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可能各人之答案均不相同。相對而言，三民主義的意涵雖然自始具有一定的隨意性，但名義上終歸是孫中山親自創製，有其言論著述作為依據。但是這種做法也恰恰證明了國民黨黨化教育實施之初的無力，黨內意見難以統一，未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其收效也相對有限。

戴季陶先後出任國民黨宣傳部與訓練部要職，其主張並非僅是個人論述，但以戴為代表的主張亦未能成為國民黨黨內共識。1928年2月3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中，陳果夫、丁惟汾與蔣介石提出〈改組中央黨部案〉，該案規定中央黨部設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民眾訓練委員會及各項特種委員會。⁸⁷3月2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組織條例〉，規定訓練部下設黨員訓練、黨務教育、黨化教育、

⁸⁵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6）第9冊，頁49-50。

⁸⁶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206。

⁸⁷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上冊，頁519。

測驗、編審和總務六科，繼續沿用「黨化教育」的用詞。⁸⁸1928年4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中央訓練部原定之黨化教育科改為黨義教育科。⁸⁹

六、結語

時人將黨化教育概括為：「(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它漸漸的浸灌到學生的腦經裡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黨的指揮。」⁹⁰該總結頗能概括國民黨黨化教育之初衷。雖然，黨化教育開展初期，國共合作尚未破裂，尚未有明確的反共目標與口號，但是訓練學生服從國民黨的組織紀律這一理念始終貫徹於黨化教育之中。

毫無疑問，黨化教育的核心在政治以意識形態對教育干涉，當中實質牽扯到了權力與話語的爭奪。國民黨以政治介入教育、以權力干預學術自由的意圖毋庸置疑，但是黨化教育具體如何實施及其實際效果是否如其所願，甚至國民黨這一泛化概念之下的具體個體是否形成共同目標實則存疑。中共後來曾以「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治」來概括國民黨的政治體制。⁹¹這種標語與口號簡短有力，具有極大的感染力與鼓動性，此種論說有其立論的依據與邏輯，但也有其鮮明的政治目的與特定的利益訴求。而前人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研究往往也非常強調國民黨以政治干涉教育與學術自由的威權行徑，對中山大學及其政治訓育往往點到即止，對於建立特定的研究範式有其合理性。

但事實上，就早期黨化教育的施行來看，所謂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似乎並未能在國民黨內確立鞏固，而在更強調學術獨立與自由的

⁸⁸ 〈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組織條例〉，《中國國民黨整理黨務法令彙刊》(出版地不詳：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1928)，頁28。

⁸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二五次常務會議記錄〉，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4冊，頁44。

⁹⁰ 叔永，〈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獨立評論》，第3期(北平，1932.06)，頁13。

⁹¹ 毛澤東，〈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解放日報》(延安)，1943年10月5日，1版。

高等教育之中，貫徹一元化的黨化教育只會更為艱難。孫中山在世時，「領袖」「主義」和「黨」的邊界相對清晰，國民黨的法統實質繫於孫中山一身。縱然如此，孫中山仍受制於多方勢力，而孫中山的主張與路線本身就因應時局的變化而調整，以至於中國國民黨的路線與三民主義的具體意涵可被調整，自始具有一定的隨意性。而在孫中山逝世以後，原有的權力平衡被打破，爭做「領袖」、爭論「主義」、爭奪「黨」的話語權同時進行。當國民黨的權力結構達到新的動態平衡以後，這種爭論也歸於平靜。但是，「領袖」的權力固然可以重新闡述「主義」的內容，「主義」卻仍有其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空間。特別在國民黨重視人情、派系複雜的體制之中，「一個領袖」或許是當權者的理想，但「領袖」卻並非天然具有「絕對」的權力與「超然」的地位，「主義」也並不具有確定性和穩定性。國民黨的「領袖」不斷嘗試修改主義以加強自身地位，但「主義」並不完全隨政治權力轉向，而始終受包括學術、人事在內其他場域與邏輯的牽制，對領袖的合法性只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卻未能以意識形態構築堅定的統治基礎。具體到中山大學，戴季陶在尚未掌握權力時，提出了委員會制、政治訓育獨立及教授評議委員會等權宜之計，在他全面掌握中山大學實權之後，這些舉措被逐步捨棄。即便如此，戴季陶在中大之內尚且仍無法決定「主義」的走向，遑論在全國民黨乃至全國的情形。

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只是黨化教育的一個手段，另一面則是中山大學的社會科學科(法科)。概言之，戴季陶等人施行種種舉措，冀望社會科學科(法科)為政治訓育服務，以三民主義統領社會科學科(法科)，同時以具體的社會學科為其作理論上的背書，從而實現黨化教育一元化的目標。實際運作中，二者確實緊密結合，但結合的結果卻並未遂其所願。究其原因，政治訓育與社會學科能夠緊密結合是由二者的特質決定的：一方面，國民黨的政治訓育是革命話語的產物，革命之目的在於改造社會，與政治、經濟和法律等社會問題、社會關係密切相關，而高校內之社會學科可謂與其有天然之聯繫；另一方面，社會學科以社會現實為立足，社會學科教授是對政治與社會變動最為敏銳的人群之一，除被迫為其服務者以外，藉此機會宣揚個人學說與理論不乏其人，甚至以此為捷徑步入仕途者亦不在少數。但是，二者的特質也存有矛盾的一面，黨化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元化」，而學者的本性與學科發展講求「多元

化」，即學術的獨立、自主與自由。五四以降，學生成為了社會變革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加之國民黨內各派均意圖組織學生為其服務，學生中既多天性反權威者、亦不乏希望藉此謀一官半職者。以至於校內亦是派系林立。據鄭彥棻的回憶，當時校內有「西山會議派」「土的黨」「中社」「國民黨青年團」「民權社」「濟難會」「共產主義青年團」「新學生社」和「醒獅派」。⁹²其現實的結果則是黨化教育「一元化」的目的難以達成。

從黨化教育、政治訓育到三民主義教育，黨化教育的用詞幾經變化，但學生始終是其主要對象。其目的都在於訓育學生，意圖使學生從精神到行動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戴季陶此後提出〈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案〉〈確立教育方針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以立救國大計案〉，吸取中山大學的經驗，意圖透過限制學生會的活動切斷學生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但是，孫中山逝世前所採取的政策路線與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密切，而在他逝世以後，國民黨黨內一時間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對三民主義的重構無統一的官方標準，黨內更因權力鬥爭以至於山頭林立，學界之中與三民主義理論解釋關係最密切之社會學科學者各有主張。上述種種原因使得三民主義的解釋實際上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試圖仿照蘇聯進行組織改革，此時其基層組織與學生工作實質上多由共產黨員負責。戴季陶所提〈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案〉與〈確立教育方針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以立救國大計案〉兩案，確係針對國民黨之短處提出，但由於國民黨的歷史痼疾亦難有實際成效，而這些因素均已反映在中山大學黨化教育的早期實踐之中。

⁹² 鄭彥棻，〈永念母校三校長〉，收於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編印委員會主編，《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臺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頁302。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與史料

- 〈國立中山大學的政治訓育部第一次工作報告〉，收入李景文、馬小泉主編，《民國教育史料叢刊》，第949冊，鄭州：民國教育史料叢刊，2015。
- 〈國立中山大學規程〉，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檔號020-001-59。
- 〈歸併大學後現在籌備中法科學院職科員一覽表〉，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檔號020-001-15。
- 《中國國民黨整理黨務法令彙刊》，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1928。
- 《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山大學圖書館藏，1930。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何思敬》，杭州：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2002。
- 國史館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3輯，台北：國史館，1988。
-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二) 報刊與雜誌

- 〈三民主義教科書審查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10月26日，5版。
- 〈三民主義教科書編撰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5月14日，6版。
- 〈中大政治訓練大綱〉，《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4。
- 〈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組織法〉，《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5-16。
- 〈公佈教科書審查規程〉，《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10月9日，5版。
- 〈全省教育大會通過黨化教育決議案〉，《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5月10日，版次不詳。
- 〈佈告〉，《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年3月6日，1版。
- 〈政治訓育部佈告〉，《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年6月16日，2版。

- 〈政治訓育部指定各種社會調查表〉，《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年6月16日，2版。
- 〈政治訓育部最近改組情形〉，《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7年9月21日，4版。
- 〈派員查辦廣東大學〉，《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5年10月16日，6版。
-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訓育部征求研究著述及外國名著翻譯條例〉，《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8.09)，頁31-32。
- 〈教務處通函續辦日報由〉，《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年2月13日，1版。
- 〈肅清共產黨叛徒之重要宣言〉，《政治訓育》，第9期(廣州，1927.04)，頁6-18。
- 〈廢止黨化教育名詞，決用三民主義教育〉，《申報》(上海)，1928年5月17日，11版。
- 〈廣東省長指令第三五號(1919年9月30日)〉，《廣東教育公報》，第7卷第4期(廣州，1919.10)，頁29。
- 〈戴季陶致中大教職員學生書〉，《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8年1月7日，4版。
- 毛澤東，〈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解放日報》(延安)，1943年10月5日，1版。
- 史尚寬，〈黨化教育的意義及其實施方法〉，《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7.09)，頁14。
- 甘乃光，〈實施黨化教育之大綱〉，《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11月3日，5版。
- 朱家驊，〈發刊詞〉，《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1期(廣州，1928)，頁2。
- 朱家驊講，林霖記，〈中大籌備之經過和將來的希望〉，《政治訓育》，第6期(廣州，1927)，頁10。
- 何思敬，〈革命與社會學〉，《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8.09)，頁11。
- 李濟深講，林霖筆記，〈政治訓育部的工作和目的〉，《政治訓育》，創刊號(廣州，1926.12)，頁1-3。
- 侃爭，〈臨別的話〉，《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廣州)，1928年1月7日，1版。
- 叔永，〈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獨立評論》，第3期(北平，1932.06)，頁13。
- 林霖，〈什麼是救黨的根本問題〉，《政治訓育》，第10期(廣州，1927.04)，頁1-2。
- 郭心崧，〈關於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之一面的觀察〉，《孤軍》，第3卷第6期(上

- 海，1925.11），頁3-14。
- 陶因，〈三民主義的必然性的觀察〉，《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5期(廣州，1929年)，頁11-27。
- 陶因，〈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7期(廣州，1929)，頁12。
- 陶孟和，〈社會科學的否運〉，《現代評論》，第4卷第80期(北平，1926.06)，頁3。
- 戴季陶講，林霖記，〈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政治訓育》，第2期(廣州，1927.01)，頁9。
- 戴季陶講，林霖記，〈世界的危機與我們應有的覺悟〉，《政治訓育》，第2卷第1期(廣州，1928.09)，頁21-22。
- 戴季陶講，林霖記，〈列寧主義的特點〉，《政治訓育》，第10期(廣州，1927.04)，頁10。
- 鍾國樓，〈為什麼要肅清中國共產黨，與我們應有的認識〉，《政治訓育》，第10期(廣州，1927.04)，頁3-5。

(三)文集與年譜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知識分子論叢》，第1期(上海，2009.12)，頁610。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何民勝，《施復亮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 何茲全、丁嵐生、萬永光主編，《一位誠實愛國的山東學者——何思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 沈成飛，〈李濟深與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廣州，2021.01)，頁63-72。

-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9冊，台北：國史館，2006。
-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雜誌出版社，1969。
- 馬亮寬主編，《何思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 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編印委員會主編，《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週年特刊》，臺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
- 張太原，〈孫中山與黨化教育〉，《史學月刊》，第2期(開封，2007.02)，頁56-60。
- 張緊跟，《百年歷程：1905-2005中山大學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
- 陳天錫主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
-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葉文心著，馮夏根、胡少誠、田嵩燕譯，《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 鄒魯，《澄廬文選》，臺北：正中書局，1938。
- 劉娟，〈「兩廣提案」與大專院全國教育會議〉，《教育史研究》，第1期(北京，2020.03)，頁38-46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卷9，北京：中華書局，1981。

(四) 論文與專著

- 盧毅，〈事與願違的黨化教育——以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福州，2014.05)，頁71-77。
- 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上海：民智書店，1926。
- 羅布·斯通斯主編，姚偉、李娜譯，《核心社會學思想家(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Practice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KMT's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The Political Discipline Educatio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25-1928)

Rui, Jun-y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spelled out in the “Resolution on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danghua jiaoyu)” passed in the Sixth Education Conferen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set up a division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KMT’s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program. This division united the party (KM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in forging a “one-party,” “one-principle” political ideology. Led by Dai Jitao, Zhu Jiahua and He Siyuan, the division relied on the teaching staff specializing in social sciences to carry out the program. These scholars were expected to deliver political speeches daily to boost a unified, “correct” political spirit across the university. However, not all scholars held the same view with the KMT,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jeopardized the success of this education program. After 1928 when the KMT’s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policy met with criticism across the society, Dai Jitao renamed the program as the education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an-min Doctrine),” despite its ideological purposes remained the same.

Key Words: KMT’s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political discipline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San-min Doctrine